



基督教文化丛书·卓新平

主编

汉语学术神学

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黄保罗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文化丛书

卓新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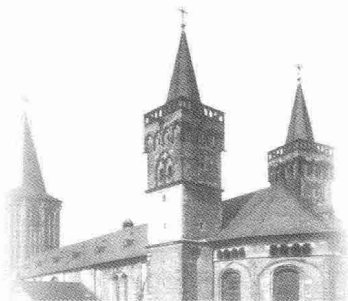
汉语学术神学

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黄保罗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学术神学/黄保罗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9

(基督教文化丛书/卓新平主编)

ISBN 978-7-80254-051-4

I. 汉… II. 黄… III. 神学-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5358号

汉语学术神学

黄保罗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125印张 410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80254-051-4

定 价: 38.00元

总 序

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既是古代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结合,亦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述,代表着世界宗教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体系,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发展步入“全球化”阶段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基督教以其“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适应着、吸纳着各种文化,体现出“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亦正形成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现代体系,而且已与华夏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了解基督教文化,展示、研习其形态或体系的今昔,对于我们跨越世纪和千纪遂有着独特意义,也是我们展开文化对话、参与人类现代文化共构的重要任务。



基督教文化涵盖极广、包罗万象,给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这里所指的基督教乃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这三大教派及其众多派系,而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性则体现为一种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相关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观念。基督教文化作为这种体系乃形成了其独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神学理论框架、语言表达形式、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法律制度、行为规范准则、文学艺术风格和传统风俗习惯等,并表现为受此信仰精神制约和灵性影响的群体及个人之生存选择、思想情趣、文化心态、审美之维和致知取向。在社会实践层面,基督教文化亦代表着以教会为核心的社会存在体制、组织机构及其各种社会政治、信仰崇拜和思想文化活动。基督教文化通过其漫长的发展而形成了“爱智”、“求知”、“重行”、“唯信”等特点,表露出“神秘”、“超越”、“浪漫”、“空灵”等意趣。其思维特色则是形象、意象和抽象的整合与共构,让人体悟到其博大、恢宏和玄奥。所以,其神秘性和超然性使基督教文化研究乃成为一种灵性世界中的探奥洞幽。另外,基督教文化也不断将各种文化因素包摄于内,随之亦参与了对相关文化体系的重建和改革,因此已广泛渗透和融入世界众多民族的信仰精神、思想认知、社会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艺术、民情风俗之中。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乃表现出信仰与思辨的统一、文化与

宗教的互渗、理论与实践的并重、“形上”与“形下”的结合。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我们提供了万花筒般的景观。

为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文化,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基督教文化丛书。丛书作者多为基督教文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和近年来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其论题涉及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这套丛书旨在展示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因此,丛书各卷将突出其知识性、客观性和可读性,以准确的描述、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文笔而力图达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之效果。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离不开许多热心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尤其与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了解基督教文化,是我们在当前“开放性”社会中认识世界与自我的一种历史使命,亦是促进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传统之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一项文化事业。在这一事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期望并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更多关注和积极参与。

序

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影响,带来了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普及,同时亦引起了对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之本真的开放性、对话性和探索性研究。因此,对于理解基督教思想体系及其精神传统和文化关联,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和多样解释,“普世神学”在这一意义上显然就比传统“教会神学”及其“教义神学”有了更多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可以说,随着基督教的开放性发展,基督教“神学”也势必成为越来越开放的体系,会越来越多地关注来自各种文化传统及其相关语境的精神资源、思想理论、认知视阈和研究方法。

“神学”(theology)这一术语自柏拉图率先使用,就具有“关于神的言论”之意。不少人基于对希腊语“逻各斯”(logos)的理解,把“神学”更加明确为“关于神的理性言说”。由于创造了“神学”这一术语的柏拉图又创办了“学院”(Academy),故此人们就会非常自然地



将“神学”、“理性”、“学院”相关联。这样,对“神学”的理解首先乃是关于“神”的“理性”、“科学”和“学术”研究。应该说,对于“神”的学术性、科学性研究这种“神学理解”更要早于对“信仰神的论证”这种“教义神学”传统。我们对“神学”术语的这一认知溯源,可以加深对“神学”发展之开放性的理解,亦能为我们在当今神学之探中归真返璞、开拓创新增添勇气和信心。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神学”理解亦出现了从“学术神学”到“认信神学”的重大转变。从此,广义的、“开放性”的“神学”被特定的、“基督教”的“神学”所取代,而这种“基督教神学”则是“以神圣启示为基础的神学”,它从“认信神学”的基本定调而影响到上千年来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所谓“认信神学”,就是说“神学家”即从事神学研究者本人需要有一个“信仰表白”;对于研究基督教神学者而言,“基督教信仰”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于是,“神学家”必须是“基督徒”,而神学的目的也只是对其信仰本身的知识性、唯理性或精神性解释与论证。由此以来,“神学”乃为基督教所专属,而早期曾用“基督教义”来与不确定的“神学”保持距离的基督教思想家则发展为中世纪将“神学”名正言顺地定为基督教“教义神学”或其“经院哲学”的基督教神学家。这种转变既然使“神学”从泛指改为专指“基督教神学”,那么也自然使“神学”有了

基督教的“教会”和“教义”归属，即成为“教会神学”和“教义神学”。

作为“教会神学”，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是其“信仰团契”的理论构建，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内在关注，因而基本上为一种“内涵式”神学。“教会神学”有一些基本原则，构成其重要“传统”，如作为其“神圣联盟”的“教会”传统，作为教会建构之传承的“使徒”传统，作为“神圣启示”之记载的“圣经”传统，以及作为“教会信仰”原则的“信经”传统等。这样，“教会神学”表达了对“教会”及其传统的爱戴、维护，有着明确的“教会性”立场。

作为“教义神学”，神学则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梳理、诠释、研究、论证和系统化。从“教义神学”则开始了基督教神学的学科化、体系化，发展出相应的“基本神学”或“系统神学”。在此，“教义神学”有着关涉“上帝论”（“三一论”）、“基督论”、“圣灵论”、“圣经论”、“救赎论”、“创世论”、“人性论”（“原罪论”）、“末世论”、“恩宠论”、“圣事论”、“教会论”等基本命题，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详尽的、积极的、充满意义的“教义”解释。当然，这种“教义”解释要求解释者即神学家本人相信其解释的“教义”乃基督教信仰真理，既真实又富有意义。而且，由于基督教信仰基于“神圣启示”，这种“启示”又记载在圣经之中，所以，以这种“神圣启



示”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必然首先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乃是一切基督教神学构建的基础和开端。“圣经神学”包括“内涵式”的“解经学”和“外延式”的“圣经诠释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学科构建，其“圣经神学”领域包括“旧约神学”、“新约神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次经”、“伪经”、“死海古卷”、“圣经考古学”等研究；其“教会史学”领域包括整个“教会历史”的纵向梳理，涵盖早期教会及其文献研究，中世纪教会及其相关的教父学、经院哲学、教会法学等研究，宗教改革研究和近现代教会研究；其“系统神学”领域包括基本神学或教义神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等研究，尤其是对其“三位一体”神论做出理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其“实践神学”领域则包括传教学、教牧学、灵修学、宗教教育、基督教社会学说，以及有更广远涵括的“普世神学”等研究。在教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教会神学”和“教义神学”已体态完备、学科齐全。

“神学”在基督教范围内既然是一种“信仰”的言述，那么其探讨就是在具有信仰的前提下对其信仰本真加以知识性、意义性解释，即一种“内在”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努力。不过，这种“信者”之“信”并非绝对的；由于人的“相对性”、“有限性”，却在从事神学研究时具有“主体性”、“主动性”，故而很难说清其“神学”

之探究究竟是来自“神启”还是“人思”。谁能判断其关于“上帝”的“言说”或“认识”乃为“上帝的自我启示”而不是“人类的想象”？其实，一切“神学”之探都是“人言”而不是“神言”，只不过是“人”关于“神”的“言述”、“解说”。这里，“信仰”的确定性就有所动摇。谁敢断定自己之“言”乃“神圣启示”，又有谁能赋予你这种“断言”的权力？鉴于人的有限存在，以及神学家之“思”仍为世人的认知，所以绝对“上帝”作为“神圣的存在”对于人而言并非“不言自明”，其超越性和超然性显然已超出“人言”的能力及把握，有其神秘性和不可穷尽性。自称“替神代言”或其“神学之言”乃“神言”本身，仍是一种僭越或“渎神”之举。正是这种原因，才出现“神学”由“关于神的言说”到“信仰神的论证”，也才使基督教思想史上自中古以来一直不断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从安瑟伦到阿奎那、从笛卡尔到康德，人们为这种“确信”寻找“确证”的努力仍在延续，迄今也并没有达到令人完全满意、满足的程度。既然“神学”是“关于上帝的理性言说”，所以它才没有停留在加给德尔图良的“因为荒谬、我才相信”之误解上，而是呈现出“信仰寻求理解”、或“理解寻求信仰”的种种探索。除了“信仰而理解”、“我信故我知”的进路外，仍然有着“理解而信仰”、“我知故我信”的反证。“神学”本身这种问“神”之难不仅为其提供了



神秘性、灵修性“捷径”，却也保留着唯理性、科学性探究的“艰难之旅”，为其有志者标示出了一条摸索、探险之路。因此，基督教思想界在其“教义神学”的理性之探中，又为其“学术神学”的存在敞开了大门、保留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其“系统神学”的视阈和立意在这种信仰前提下主要体现为“学术神学”，而且与纯“学术”之间也有着相似的问题意识。

由于基督教信仰源自“两希”（“古希腊”、“古希伯来”）文明，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得以成型，因而与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实际上，基督教神学乃与西方思想文化精神有着极为密切和复杂的交织，二者这种难解难分、共融一体一方面使基督教神学的“学术”之探成为了“西方的学术神学”，另一方面则使基督教在面对“汉语世界”时乃是以一种“西方”姿态和身影来出现。在当代中西思想文化的交锋与交流中，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思想文化开始了一种新的体认，对基督教神学亦有了一种新的探讨。根据“汉语世界”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资源，一种“汉语神学”已应运而生，其特点则是突出神学的“学术性”而淡化其“教会性”，并以一种“广义”理解而表明了“汉语神学”的开放姿态和开明意向，从而给神学在中国带来了“海纳百川”的气象。而且，其对“学术性”的关注也使人们重新对“西方的学术神学”产生兴趣、将之纳入研究

视阈。

在这种当代学术氛围中,黄保罗博士完成了其研究专著《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这里,黄博士将“汉语”与“学术”揉在一起,表明了其“神学”整合的意向。黄博士在北欧潜心研究十余年,既有着西方学术神学的系统训练,又一直保留着华人学者中西比较的学术传统,尤其对中国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比较研究情有独钟,在这一领域成果颇丰,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当然,黄博士这一“汉语学术神学”主要乃是用“汉语”来介绍、描述和解释西方学术神学的研究及其教学,为人们展示出西方基督教神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景观。这种用“汉语”撰写的基督教研究论文当然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汉语神学”,而其对“学术性”的突出和对“教会性”的淡化也应该被理解为“学术神学”的表述。不过,正如“汉语神学”介乎“认信基督”和“信仰中立”两种态度之间的模糊地位那样,其所论述的“汉语学术神学”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传统理解的“认信神学”的特点,即反映出“西方学术神学”的基本立场和认知痕迹,从而与中国内地人文学术界目前所追寻的“不需要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和委身”、“基于宗教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研究成果”而对基督教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神学”有着明显区别。但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既然这



种方兴未艾、正在摸索之中的“学术神学”有着与“西方学术神学”相似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围,既然其呈现与发展有着明显的“汉语”语境和归属,那么黄博士的这部著作就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亦会为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神学”的价值独立、信仰中立之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学术神学”作为中国当代基督教研究的一种新进路,并不是要“超越”基督徒的信仰来“科学地验证”其信仰的真伪,而是旨在对基督教神学所思考的基本问题尝试加以客观、理性、科学地探讨。

卓新平

2008年4月26日于北京

序

什么是汉语神学？

近代不少学者指出一种新思维的诞生和形成离不开几个基本元素，就是个人、个人从属的群体和所属群体身处的社会脉络。若我们从这个层面去检阅汉语神学的诞生和形成，我们就可以看见汉语神学的端倪和独特之所在。

社会脉络

众所周知，自中国内地于 1979 年迈向改革开放后，首当其冲使学术界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序幕，学界普遍要求放弃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学术方法，并要求以理性和客观的学术方法重新评估中西方的学术传统。有学者更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的“新启蒙运动”。



个人——倡导者和推动者

在那个高举理性主义、知识重构、重估中学、引进西学的社会脉络中，有为数极少的学者虽然互不认识，工作岗位又不尽同，但却异口同声地指出应对西方文化背后的基督宗教思想资源进行更广泛、客观、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否则中国学界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为何物。就此一场以学术研究为基点的思潮就在不同的大学和社科院系统里慢慢又静静地展开。描述它是慢慢又静静的旨在说明纯粹的学术工作是没有掌声和冷凳一张。我们称这些为数极少的学者、个人，为汉语神学的倡导者。

另一边厢，与大陆一河之隔的香港和海外教会学界，也有为数极少的教会学界学人与大陆学界有兴趣研究基督教的学人接触后深受启发，遂展开不同深浅程度的合作，互补长短。其中香港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更于1995年因应大陆学界的特定需要而在香港正式立案注册为一所非牟利的学术机构，成为首间以中国内地学界为主要合作伙伴和建设“汉语神学”为己任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称这些为数极少的学者——个人——为汉语神学的推动者。

不同的群体——主客有别,互动互助

诚如上文,汉语神学的倡导者所属群体是中国内地的人文学界,这个学术群体的研究志趣多以基督宗教的研究来激活和丰富自己所属学统和中国学术。为此中国内地的人文学界、学术群体就成了“汉语神学”的特定场地和特定群体,这个特定的群体自然有其自成一格的人文性言语和人文性研究法则,大陆的人文学界要处理的社会脉络是大陆的社会脉络,其思想形态和言语表达又与非大陆的社会脉络颇有分歧。

至于“汉语神学”的推动者虽然也来自专业的学术界,也具备一定的学术言语和研究法则。但由于其群体从属还是以非人文性—认信教会为依托,就此教会群体和人文性群体的学术言语和研究法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推动者和倡导者的社会脉络又是各自精采,不尽雷同。

既然双方差异是如斯明显,推动者与倡导者遂经多方努力达成两个重要的工作共识,一则彼此确认汉语神学可分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层面,广义者指凡以汉语撰写的基督宗教研究论文皆统称为汉语神学。这称谓的性质不是霸权性而是包容性,至于不同群体的学人是否采纳这定义皆属尊随悉便,自由定夺。狭义